

- 农村衰败与晚清现代化的受挫
- 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
- 村治中的政治人
- 农地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
- 此集体并非彼集体
- 农村政治研究：缘自何方，前路何在

转型社会的乡村政治

詹启智/主编 吴毅/著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学者文库

百篇农村问题研究优秀论文选编

“三农”问题研究优秀论文选编

转型社会的 乡村政治

詹启智 主编
吴毅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社会的乡村政治 / 詹启智主编; 吴毅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1
ISBN 7-109-10700-0

I. 转... II. ①詹... ②吴... III. 农村—群众自治
—研究—中国 IV. 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6198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出版人: 傅玉祥

责任编辑 卫 洁 周承刚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26.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吴毅 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历史学学士),199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法学硕士),200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法学博士)。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中国评论》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与中国农村研究。在各类权威和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转载论文50多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多部,个人代表作为学术专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

本书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发展、特性与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出版说明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学者文库》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为深入研究“三农”问题，真实反映我国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而编辑的丛书。

本文库作者是在全国“三农”问题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和专家。文库汇编作品是各作者在多年研究“三农”问题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精心编著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反映了作者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和学术成果。本文库是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力作，展示了我国新时期“三农”问题研究的新走向。

选入本文库的作品，表达了理论界、基层工作者对“三农”问题的各自思路。有的观点新锐，凸显改革情结；有的看法不同，可能见仁见智，本文库编者对此均未加评述，只是构建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平台，从而给理论界、基层工作者的研究和思考提供丰富多彩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思想。相信读者会根据自身的理论底蕴和实践经验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和取舍。

编者对本文库选编的作品进行了适当的编辑加工，对一些作品根据体例统一要求，增加了部分小标题，个别作品对篇名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本文库的编辑出版，是我们对“三农”问题研究和出版事业探索的阶段性成果。今后，我们在“三农”问题上还要继续为优秀学术成果的出版与传播进行不



懈的努力。期望全国各地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在基层工作的朋友们继续支持“三农”图书的出版工作，共同为繁荣我国“三农”问题研究事业做出贡献。

在本文库的出版过程中，得到有关作者与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编者

2005年12月18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上篇：历史变革中的乡村权威

农村衰败与晚清现代化的受挫	2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	
——四川双村 20 世纪上半叶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	10
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	
——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	20
村政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一个小村庄的百年大历史	3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稳定形态及其效应	
——对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一项因素的分析	42
村民自治的成长：国家进入与社区内生	
——对全国村民自治示范第一村及所在县的个案分析	51
新规则是如何演绎的	
——一个村庄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解读	58
记述村庄的政治	
——田野札记	70

中篇：现实语境下的乡村政治

村治中的政治人	
——对一个村庄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	76
去政治化的村庄生活：对川东肖村的观察	82
缺失治理资源的乡村权威与税费征收中的干群博弈	
——兼论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	99
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	106
税费改革中乡村利益张力下的村级财务困境	
——对中部某省 T 乡的观察	115



农地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

——田野札记..... 123

农民“种房”与弱者的反“制”..... 127

“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

——田野札记..... 131

下篇 三位基础上的研究探讨

村治研究论纲

——对村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尝试性揭示..... 136

村民自治：理论资源和运作绩效

——对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及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两文的评议..... 145

此集体并非彼集体

——读《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149

不同语境下的乡村关系..... 151

农村政治研究：缘自何方，前路何在..... 155

附录

村民自治架构下的公共权力变迁

——湖南省白鹤村村治调查..... 161



历史变革中的乡土权威

上篇

历史变革中的 乡土权威

乡权的变化，是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在历史上，乡权的来源和性质都发生过深刻的变化。随着国家权力的渗透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传统的乡土权威逐渐衰落，新型的乡权正在崛起。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深刻变革，也体现了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

历史上，乡权的来源多种多样。有的源于血缘关系，如宗族势力；有的源于地缘关系，如乡绅势力；有的源于经济关系，如地主势力。这些乡权在维护地方秩序、调解纠纷、组织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国家权力的深入，传统的乡权逐渐受到挑战。国家通过建立基层行政组织，将权力直接延伸到乡村，传统的乡权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乡权的来源和性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型的乡权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实力和公共事务的组织能力。这种新型乡权的崛起，反映了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同时，国家权力的深入也赋予了新型乡权新的合法性。国家通过建立基层行政组织，将新型乡权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



农村衰败与晚清现代化的受挫

晚清现代化受挫的原因，犹如现代化研究领域里的司芬克斯之谜，不断地吸引着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对其破译，本文则从现代化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入手进行探析。笔者认为，由于晚清现代化并非一个自然渐进的历史进程，而是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被迫回应，这种回应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为需要，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实现这一需要的保障，由此便决定了它与农村之间的历史定位：现代化只能是发生于城市社会的孤军突进，与农村基层社会严重脱节。这样，晚清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只能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这种分裂的空间结构使农村被抛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不但难以品尝现代化的初期成果，反而必须承载现代化启动的重负。在这种境况下，农村陷入了严重的衰败与动荡之中。并以这种衰败与动荡的逆反应，构成了晚清现代化受挫的一个深层原因。

分裂的现代化结构使农村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成为被遗弃与牺牲的弃儿。这种遗弃与牺牲首先表现在经济社会的层面。

1. 现代化推动者对农村的忽视

晚清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首先发生在城市。城市是前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首先感受到近代文明的压力。随着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开埠通商，晚清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便首先在口岸城市肇端。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压力与机遇只会波及城市。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农村也同样感受到了现代性的压力。沿海和口岸城市附近的农村受外国资本主义渗透而逐步开始的自然经济解体过程就是一个明证。如上述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农产品开始突破了狭小的地方市场限制，贸易交换的空间范围扩大，部分农副产品甚至进入了国际市场。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些变化未必没有给中国农村提供一次新的历史性选择与转换的可能。

然而，历史却表明，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为现实性。转变之所以未能实现，除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抑制了农业变革这一外部因素之外，晚清现代化的推动者对农村的忽视贻误了农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则是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当时，尽管存在着不利的外部环境，近代西方的农政理论及农业科学技术毕竟也开始渗入国内，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不可能对此毫无感受。这一时期，也确实有人倡言以西法改革中国农业，克服传统农业已经呈现出的衰败和停滞。但是，这些言论却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不用说引起一场与城市工业化并行的农业革命了。分析其中原因，

除了现代化推动者自身对农业变革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之外^①，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晚清工业化乃民族危机所促发，其得失成败直接关系到清王朝的兴亡，而农业与国运的关联在当时尚没有那么直接。而且，要在一个素以高度农业文明成就自豪的国家中倡行农政改革，仿行西法，其重要性与紧迫性一时也难以为大家所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已经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外交失败弄得焦头烂额，除了将全部精力用于维持统治之外，它已经没有更多的能力去履行一个政府在正常状态下所应履行的诸多社会经济职能，包括保护和发展农业的职能（指客观上而非主观上）。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便几乎承载了晚清中国的全部使命和希望。现代化的推动者们将他们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到了新政与洋务方面，相形之下，农业的变革被严重地忽视了。于是，当工业化勃兴，开始扮演晚清社会发展的主要角色时，在前现代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农业便黯然失色，悄然退居后台。受这一历史变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社会上层人物（包括农村社会的下层）也把注意力转向城市，谋求在城市的发展。他们更关心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而逐渐与农村疏远和隔膜。就这样，在农业和农村同样需要国家扶持和社会关注的时候，它却被置于一一种无人问津和放任自流的境地，成了现代化的“弃儿”。作为这种无人问津和放任自流的必然结果，现代性挑战所带来的机遇没有被抓住，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阵痛却被充分地放大与承受。

2. 工业化对农业的挤压与农村加速贫困化

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始终在晚清工业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晚清的军事工业均为官方出资兴办，其他如采矿、金属冶炼、机器制造业等或为官办，或为官方参资，或为官方垫款兴办。这些新型工矿企业耗费了清政府的大量钱财。仅以1864—1894年兴办的24个军工企业为例，其中由清政府创办的五个大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汉阳枪炮厂）在近30年的经营中就耗资白银4100万两以上，其他的各省营办的企业也耗资1000万两以上^②。这笔支出十分惊人，据估计，已相当于19世纪70年代末清政府一年的总收入。又据研究，清末所推行的洋务运动岁需银约2000万两。由此推算，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甲午战争之前，各种洋务费用已超过6亿两，在这一时期政府的各种支出中高居榜首。

如此庞大的开支出自何处？依据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业化初期，农业在整个经济中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讲，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任务都将主要落在农业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田赋、盐税、茶税，以后又开征关税和厘金。这一时期，为应付庞大的支出，各主要税种日渐增加。以田赋为例，康熙年间虽有“永不加赋”的圣示，但在财政需求膨胀的压力之下，各种附加田赋相继出现，且附加税额逐渐超过田赋正额。光绪中叶，为了支付新

^①例如，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就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并未能进一步追究掩藏于现代化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他曾说：“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桀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为此，他提出了农业技术改良的一系列设想，但也就到此为止，没有触及到制度问题。

^②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政用款和战争赔款，又允许各省自由筹款，此例一开，各省的田赋附加更是名目繁多。至宣统初年，“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①。田赋是直接向农民征收的，田赋加重，“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以自足者，今者岁暖而号寒，丰年而啼饥矣。”^②其他税种，亦多呈不断上涨趋势。各种赋税负担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在晚清社会的主要成员——农民身上。

晚清工业化对农业的挤压虽有不可避免的一面，但是，挤压过度或只挤不补，便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经济的衰败。咸丰举人强汝洵在《求益斋文集》中曾对当时农户的生活状况作过详细分析：“今时（同治朝后期），南方之田耘作精密，人不过耕十亩，上腴之地，丰岁亩收麦一石，稻三石，其入四十石耳。八口之家，人日廩米八合，老稚居其一半，人日廩米四合，率日食米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麦当其三之一，尚食米十一石有奇。率稻一石为粳米三斗，则留稻二十三石，麦六石，然后卒一岁之食。余麦四石，稻七石，乘急而卖，幸得中价，麦石值钱一千二百，稻石值钱八百，凡为钱十千四百。纳租税及杂徭费率亩为钱五百，十亩则需钱五千，余钱五千四百耳。而制衣服，买犁锄，岁时祭祀，伏腊报寒，亲戚馈遗，宴客饮食，嫁女娶妇，养生送死之费，皆出其中。而当凡物皆贵之日，其困固宜。况所耕不及十亩，或值瘠土遇歉，又处赋役烦重之区，而当谷贱之时者乎？北方农事疏恶，人可耕数十亩，而所入尤薄，故愈困。”^③强汝洵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一般农户在沉重的赋税压迫下的生活窘况。农民的贫困严重地摧残了农业经济，导致了农民的逃亡，加深了农民对高利贷的依赖，使自耕农沦为佃农。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经济之凋敝日甚一日。

3. 近代城乡二元结构的发轫

晚清工业化对农业的挤压是近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作为纯消耗性产业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不能直接给农村经济带来发展机会，也无法直接在资金、技术方面给农业以补偿，对于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农业仅仅意味着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奉。这就决定了晚清工业化始终不能给农村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所以，当现代化逐步改变城市经济社会的面貌时，农村则基本上一如既往地沿着传统道路滑行。一方面，城市引进了机器与近代动力系统，另一方面，沿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农具仍然是农村的基本劳作工具；一方面，工厂代替工场逐步改变了城里人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依据天气和节令确定的农业耕作方式仍旧因袭古制；一方面，近代工厂的大规模和集群性开始代替手工工场的小规模与孤立性，另一方面，单家独户的小农经营仍然是农业最基本的经营方式……这一系列差异，即是现代化初期产生的现代产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的二元并立现象。不仅如此，随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城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风貌方面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全面对立，即“近代化的城市生活与中世纪的农村生活相对立，用机器生产的城市工业与用手工劳动的农村农业相对立。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经济与封建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相对立。外国侵略者、城居

^①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

^③《求益斋文集》卷四，“农家类序”，第15~16页。

大地主、大高利贷者、银行家、政府机关和官僚们所在的城市与贫苦农民居住的农村相对立。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的主要集中地城市与赋税、地租、利润的主要来源地农村相对立。”^① 这一系列对立实质上也就是城乡在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结构现象。这种二元结构，破坏了前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同质性，造成了传统城乡一体化结构的破裂，并且使新的一体化结构迟迟不能建立。这一后果意味着农业与农村进一步丧失了变革与发展的可能。

总之，晚清农村在上述三个方面的重重压力之下，陷入了深刻而持久的危机。这种危机从表现形式上看似乎只是在重现昔日王朝更迭时的常有征象，如耕地荒芜，农业生产萎缩，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购买力缩减，农村金融窘迫，农民生活条件恶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衰败与动荡。但是，在晚清社会现代性与传统两大文明激烈碰撞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农村衰败与动荡综合征便具有了并不局限于推动王朝更迭的新的历史意蕴。这种历史意蕴主要表现为，当晚清上层社会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对抗中陷入分裂，其中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完全战胜对方，把握晚清社会的走向时，农村及农村的衰败与动荡便从社会基层开始对现代化的前景和走向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加重了传统社会对现代化的阻遏与抗拒。

二

农村经济的衰败是阻碍晚清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农村衰败使农业没有能力为工业化提供充足的资金。以田赋征收为例，当时各省实际征收额与应征额之间几乎总是存在差距。1903年各省统计数据表明，除吉林、热河以外，无一个省完成地丁银的征收。以下是一些省份应征额与实征额的数据比较：直隶应征白银2 606 273两，实征2 259 574两；奉天应征37 290两，实征36 960两；江苏应征2 570 400两，实征2 001 998两；湖北应征1 269 083两，实征1 024 119两^②。这些数据差表明农村已经无力满足国家日益膨胀的财政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能另辟税源，举借外债。1853—1893年大借款之前，清政府就已对外借款4 600余万两，这些借款多用于兴办洋务。这一时期，政府财政税收的来源虽然有所增加，但新增税收中却有相当部分（如厘金中的相当份额）并不能直接归中央政府支配，关税率的变动也要受到列强制约，以土地税为核心的农业税收仍然是唯一完全归中央政府掌握的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但是，此时国家却无力从农村提取更多的资金。虽然土地税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然其在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却逐次递减。18世纪中叶，各种农业税提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70%~80%，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支柱，到清王朝终结时，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5%左右，农业税已经很难在晚清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学术界存在各解释，笔者认为，因农村衰败所造成的农业剩余降低和资金枯竭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前述关于工业化对农业的剥夺以及农村贫困化的分析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晚清农业生产总量固然仍有缓慢增长，但已经远

^①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②梁方仲，中国历史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远无法满足增长极快的财政需求。以工业化的需求标准来衡量晚清的农业，后者实在显得相当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所造成的资金障碍泯灭了广泛工业化的任何可能^①。如果再考虑到对外大赔款以及人口增长对农业所造成的压力，那么，我们实在难以对晚清农业支撑工业化的能力做出任何乐观的估计。

农村经济衰败的消极影响还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对现代化的制约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虽然不无冲破传统经济低水平均衡的历史意义，但是，在晚清众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挤压，对现代化构成巨大压力的特定时期，二元结构的出现只是在增加这种压力。

首先，二元结构的极化效应过强，城市突破难以带动农村崛起。晚清城市的现代化是一个突起的过程，人为性极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所具有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赶超型特征又使城乡分离的速率过快。这种人为性和高速率使城乡之间的单一核心——边缘结构难以向多核心的新型经济空间一体化结构转变。城乡分离的结果只是以广大农村与小城镇的衰落为代价，换取了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因此，当现代化的鼓噪开始在大城市甚嚣尘上之时，农村和小城镇只表现出一种衰败后的孤寂与冷清。

其次，二元结构的扩散效应弱化，城市发展呈现出闭锁性^②。由于自晚清开始出现的城乡关系的尖锐对立以及整个上层社会对农村的忽视，致使二元结构的扩散效应始终难以充分发挥。相反，零星的大城市犹如兀立于传统农村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表现出自我封闭式的发展。广大农村则在城市的吸纳之下，资金、原料大量外流，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于是，从总体上看，城市愈发展，农村就愈落后；城乡差异愈显著，现代性因子就愈难以扩散；扩散效应愈弱化，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分裂就愈严重，经济社会结构的分裂愈严重，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任务就愈难以完成。

三

农村经济的衰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最终导致晚清农村的社会与政治动荡，使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全丧失。

农村经济衰败的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农村在衰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国家的疏离，这种疏离严重地削弱了国家对农村的整合与控制；自古以来，中国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并不存在一种直接的制度控制。隋唐以后，国家正式的政权机构只延伸及县，县以下，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乡绅阶层这一中介实现的。乡绅阶层实际上是前现代官僚制国家整合与控制农村的一个虽非正式、却不可缺少的层级。乡绅的这种特殊地位意味着他们与国家关系的疏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对农村整

^①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晚清的农业剩余与国家对这一剩余的低提取能力的矛盾，并做出了各种解释。本文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剩余是不能否认掉农村普遍贫困的事实的。农业剩余不如说更准确地反映了农村土地占有不均的事实。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应进一步考虑将这些剩余转到工业化时所存在的制度与观念障碍。

^②极化效应指较为发达的经济核心区（如农村）吸入各种要素和资源壮大自己，引起边缘区衰落。扩散效应指经济核心区向边缘区输出资金、技术与设备，将经济社会的现代性因子辐射至边缘区。扩散效应与极化效应呈反向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扩散效应的作用便日益增强。

合与控制能力的强弱。但在晚清现代化以及现代化所致的农村衰败过程中，乡绅的这种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冲击。如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和农村衰败使乡绅的经济地位从总体上处于下降之中；又如晚清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乡绅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与官僚制国家的制度性联系；再如西方文明对儒学的冲击以及城市近代教育的出现，动摇了乡绅作为道德教化载体的师统地位。面对这一系列变化，部分乡绅顺时应势，转化成为新兴的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更大一部分因循守旧者却无法适应变革中的环境，其地位与权势逐渐衰落。由此，一种愤世、失落、失去社会归属感的心里在乡绅中滋生。这种心理导致了乡绅玩世不恭、不负责任之利己主义的泛滥。他们乘国家忽视农村的空隙，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因此，其“合法性下降了，而剥削性却加重了”^①。乡绅的蜕变，给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导致地方主义恶性膨胀，使国家与农村的联系脱节。乡绅们不再表现出作为精英阶层的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勾结地方官吏，称霸乡里，与国家政权貌合神离。这种趋势加速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开始出现的地方势力的膨胀，国家权力流失的过程，成为清末民初之地方割据，军阀崛起和国家分裂动荡的重要原因。乡绅蜕变还导致了农民与国家的联系脱节。乡绅的蜕变，使豪强、恶霸、地痞、流氓之辈占据了农村社会权力的中心位置。这些人横行霸道，欺凌百姓，将原来多少存在的宗族与家族的联系纽带扯断；于是，农民既无法得到国家的保护，又失去了乡绅所曾给予过的一点可怜的荫庇。作为一个孤立无助的阶级，现代化对农民仅仅意味着更加沉重的榨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认同降低了，与上层社会的联系松弛了。农民阶级疏离于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又一次开始扮演瓦解王朝统治的传统角色。

上述方面给晚清现代化以致命打击，使清政府无法集中力量动员各种权力、物质资源支持现代化，并通过对社会的强力整合与控制，克服外部压力和因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而激发的内部矛盾，而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是否具备这些能力往往是其现代化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由于农村对国家的疏离，致使传统政治控制结构松散，权力传递之链中断，作为农民帝国之晚清的社会政治基础开始土崩瓦解。

农村经济衰败和政治控制减弱的直接后果是农村社会秩序的崩溃。

(1) 游民对晚清社会的压力。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业游民。当时，在全国许多城镇都聚集着一支庞大的游民队伍。如山东地区“人多田少，不敷耕种”，闲日多^②；福建永春一带，“田土瘠隘”，百姓“资生无策，半游食于延津两府”^③；四川、广东等地的游民就更多。这些游民到处流浪，或乞讨，或偷窃，或拐骗，或投身娼妓业，客观上为社会大动荡提供了社会因子。

(2) 盗匪蜂起。农民无地可耕，“弱者坐守饥困，黠者流为剽窃”，使晚清社会成为一个盗匪蜂起的世界。农民为盗，多因谋生无路。“贫人既无生计，饥寒亦死，为盗而为官

①G·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朱寿朋，京华续录，光绪朝190卷。

③徐继畲，徐龛先生全集“奏疏”，卷下。



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饥寒交迫，必死无疑，为盗虽犯法，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为官所捕。即捕，亦不过一死。是不为盗则死在目前，为盗且可以侥幸不死”^①。这段分析较为准确地反映了绝大多数沦为盗匪之农民的心态。

(3) 农民暴动连绵不绝。如果说游民和盗匪的压力至多不过是对晚清社会秩序的一种消极和无序的冲击，那么，有组织的农民暴动则是对这种秩序的积极突破。据杨庆堃根据大清历朝实录进行的统计，1866—1875年民众运动达909次，1896—1911年达653次^②。又据载，仅清末最后十年，以抗税、抗捐为主要内容，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就不下20余起。农民暴动多因农民与上层社会在制度上的联系过于脆弱以及这种联系的剥削性特征增强。这两个条件在晚清皆具备，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精英未能实现与农民的结合，农民暴动才没有来得及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起义。即使如此，农民的暴动也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大伤了清王朝的元气，并且在客观上使现代化所必须依赖的有效的社会控制丧失。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的动荡造成了城市与乡村在空间上的阻隔。这一阻隔使清政府无法再对农村发挥有效的影响，也使城市新兴社会势力难以顺利地渗透于社会底层。于是，在20世纪初，当朝廷内部现代派与传统派的较量逐步让位于朝野之间的现代化派的较量时，农村却远远地游离于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之外，又一次由超稳定走向了无序化的历史陷阱，并因此而对晚清及晚清以后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复杂影响：它使清政府中那些图谋新政者丧失了本来可能凭借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动员的最后一支社会力量——农民去还击城市知识精英的挑战；它也使作为西方文明最积极传播者的城市知识精英无法动员广大农民进行一场彻底变革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革命；它还使陷入无序状态的农民大量地被军阀、豪强收罗，使这些集新旧观念于一身的地方军人集团成为介于清政府和反清知识精英之间的、实际上对形势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第三种势力。清政府在反清知识精英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夹击下垮台之后，国家政权落到了形形色色的军人手中，这些急于填补因清廷垮台而出现的巨大政治权威真空的军人们无心去疏通城乡之间的阻隔，反而通过一系列战争给农村带来更大的动乱与灾难，使农村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渊藪。这种结局向人们预示：自晚清开始的，通过城乡分裂型现代化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道路已经逐渐被堵死。

农村对晚清现代化最顽强的抵抗则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层面。狭隘和保守是传统农民的典型心态，而经济的衰败和社会与政治局势的动荡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这种心态。他们终日为世态变幻对自身生存的影响而焦虑，希望安稳而非变化，希望权威而非自由。所以，客观地讲，未经组织而作为个体存在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往往是保守主义者，是传统秩序的维护者。这种根深蒂固的贫民保守主义与特权阶级的保守主义一样，“都是力图使既存社会秩序永久化的一个因素”^③。这样，晚清现代化在政治文化上就受到了来自城乡上层保守势力和下层贫苦农民的双重夹击。这两大势力虽然拥有完全不

①《清稗类钞》“盗贼类”、“乞丐类”、“拐骗类”、“娼妓类”。

②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埃里克·霍弗，真正的信仰者，转引自S·亨廷顿·转变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